

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

国际政治的 系统和过程

莫顿·A·卡普兰 著
薄智跃译 潘维洛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00031 · 北京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RTON A KAPLAN

Copyright © 1957 by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根据约翰·威勒出版公司1957年版译出)

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

(美) 莫顿·A·卡普兰著

薄 智 跃 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9.875印张 224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142-6/D·114

印数：5000册 定价：3.80元

社会文化开发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

组织翻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

《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

编委会

主 编 周吉荣

副主编 宋新宁 邓正来 白 希

王建潮 陈兆钢

编 委 邓 勇 胡少华 王缉思

江 山 邹克渊 周 琪

总审校 邓正来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薄智跃先生将《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一书译成中文，并附上此序以示感谢。我期望，在明天的世界上，中国和中国新一代的学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是1955年到1956年间写就于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当时我刚刚完成《美国对外政策：1945—1955》（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5）一书的初稿。到那时为止，国际关系一直被视为一个无政府系统，其中权力决定结果。当时，人们也使用“均势”和“两极”这些术语，但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对同样无政府的过程进行描述的语汇。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明显错误的。确实，正式的国际政府并不存在。但是，当时一些部族也没有什么政府，而系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却存在着，并且延续下来。

在我写有关对外政策的书时，我发现“均势”系统和松散的两极系统之间在系统特征方面存在着诸多实质性的区别。我认识到在两极系统内越出北约而建立联盟何以无效的原因（这与“均势”系统的情况形成对照），也懂得了为什么不结盟的行为体和组织如联合国即使不象某些最热衷于这类组织的人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惊天动地的潜力，也可能具有真正的功能价值。同时，我阅

读了罗斯·阿什比的《大脑之设计》，这本书为我在分析这类丧失功能的现象时使用系统分析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西方，50年代中期也是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时，我并不赞成这种哲学观点，但我还是把关于价值的那一章放到附录中，以免遭到因宣布价值的客观性而可能引起的、暴风雨般的批评指责。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发展我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在《科学、语言和人类的条件》(《Science, Languag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N. Y., 1985; revised edition 1989)一书中以最系统的形式提出。在这本书中，我建立了一种相互关联的语言理论，采用了布尔的互补理论以避免在结构松散的世界所出现的矛盾，并提出一种基于理论互补性和实际估价的科学哲学。我还说明了当不能完美地把一种语言或理论思想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或理论思想时无法采用同一标准的问题如何得以解决的方法。据我所知，唯一与我的观点相近的观点反映在里查德·施莱格尔(Richard Schlegel)的大作《关联现实主义》(Contextual Realism, Paragon House 1986)中。

我们当时采用了两种方法来建立《系统与过程》的理论。其一是使用计算机。在计算机上，我们采用了我们称之为“均势”系统的“现实化模型”，因为我们不能找到一种严密的演绎方法来为象国际系统这么复杂的系统建立一种理论。当然，我们并没有把该系统的基本规则输入计算机，因为假使我们这样做了，显然会得出与规则相一致的行为来。我们所采用的“现实化模型”涉及到把这种理论的某些特征作为参数编入计算机程序中的问题。我们当时采用了各种参数以了解计算机程序对参数变化的敏感性。这样，才有可能发现局中人的数目、交战的比率、局中人的动机等等变化。

编制这样的程序存在若干问题。就形式而言，每个计算机方

程式都是特定的，而不是一般的。因此，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就是：这些方程式可能与事实相悖。所以，我们芝加哥研究小组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计算机程序的各种单一特征，目的是想弄清楚程序中某些不应当与现实世界的相关特征联系起来的微小差异不会影响计算机的运算结果。

这种计算机模型只有在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是最优化的。战争重复出现的情况过于复杂，计算机无法保证长期的最优化。但是，如果确定了行为体的效用表——若没有这样的效用表，它们就没有动机，而没有动机，行动就不会出现——我们就可以进行计算，看由这个程序建立起来的局的格式是否产生与局中人的效用表相“吻合”的结局，或者是否某种别的格式会更好些。

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变量是行为体对其它行为体之间的“平衡”的忍受程度。可以假定这一变量很大，也可以把它假设为零。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体所关心的只能是增强自己的实力。这种情况是一种特殊情况，它与沃尔兹的无政府系统相一致。在沃尔兹的无政府系统内，每个国家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只考虑外部的限制因素。这种情况与赖克的模型也是一致的。在赖克的模型中，在只有一个回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零和最优化。当追求“平衡”的倾向很强时，系统内不会出现战争。当追求“平衡”的倾向既不弱也不强时，系统会一方面不断出现战争一方面又保持绝对稳定。如果连一个行为体都不能容忍“平衡”，系统就会很快出现不稳定。

在这种简单的层次上，计算机的例子可以说明历史对比研究所业已揭示的事实。如果行为体不是自觉地考虑系统稳定的要求，那么，只有在某种系统之外的因素——如后勤或政权困难——阻止该系统的运转的情况下，“均势”系统才会是稳定的。另外，只有当一个行为体为了谋求霸权甚至不惜冒被毁灭的极大风险时，它才会产生违犯基本规则的动机。

就系统之外的原因而言，只有建立一种对付背离活动的标准，行为体才不至于甘冒一切风险以获得霸权。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是稳定的，即便没有这种相当于规则四或规则六（行为体由于某种系统之外的原因而被消灭的规则）的规则，有谋霸倾向的行为体表现出这种倾向也无益于它的长远利益；从长远看来，这个行为体如果这么做，它就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只有在系统条件出现某种别的异常——其它行为体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所处的局势，或因政权内部的问题使它们无法正确认识局势——时，有谋求霸权倾向的行为体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所有这些规则对于平衡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这套规则是完整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的边际变动范围内是稳定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局中人对遵循规则感兴趣，以及为什么联盟系统具有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我们解释了除非某种系统之外的原因因为它们提供一种可望成功的机会，追求霸权的局中人会遵循规则的原因。进一步说，系统的平衡还取决于行为体在制订决策时把系统的结构考虑进去的事实。而且，这一系统显然是一个非零和系统。计算机模型证明：沃尔兹对基本规则的反对纯属误解。

我来总结一下计算机现实化模型所证明的。我说“证明”，不是说要“通过验证来排除一切疑问”，因为无论是对语言理论还是对计算机模型进行适当分析都会使现在尚不明显的问题突出出来。另外，我说“证明”，是因为与语言理论框架结合在一起的现实化模型已经达到一种比著述中任何别的东西在前后连贯、精确分析和理论适当性的理解方面都高得多的状态——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怀疑可以站得住脚。

现实化模型证明：在平衡的条件下，规则集中没有矛盾。它说明：没有一个规则被违犯；除了对付背离行为的规则——在没有追求霸权的局中人的情况下，这条规则是没有必要的——之外，所有的规则都为行为体所遵守。这种阿拉伯数字的现实化模

型证明：如果谋求霸权的局中人是系统中的一个行为体，而且这个行为体行为的动机就是谋求霸权，那么，假使没有制约背离行为的规则，这个系统确实会变得不稳定起来。由于它证明了对于追求“平衡”的局中人来说该系统会因此而变得不稳定和充满危险，所以它就为增加一条制约背离行为的规则提供了一条充足的理由。这么一来，系统就会变得高度稳定。计算机模型没有证明稳定存在一个上限或下限。尽管我们确实曾经建立了一种支持我定性分析的论点，但这一问题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还是过于复杂。理论的这一方面加强了规则六。计算机模型还证明：在“均势”系统内，联盟是三对二还是四对一取决于战争的代价和旁支付是否可能；因而，赖克的尺度原则并非普遍适用。这一工作概括说明：“基本规则是互相矛盾的”这种说法是无效的。

研究的第二种方法是历史事例分析方法，肯尼思·沃尔兹对此也提出了批评。沃尔兹引用弗兰克在《国际关系新方法》(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中的文章，试图用之来证明他所声称的我的一个弱点，即我把——

一个因变量变为一个自变量……说明结果的规律和产生结果的行动规则之间的差异必须细心加以辨别……卡普兰写道。仿佛行为体只要想产生一种给定结果，它们就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关于这种错误做法会导致什么的最好说明可以在卡普兰原来的一个学生的文章中找到。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14和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与卡普兰的规则一和规则四不相符合。

我必须承认，我很惊奇沃尔兹声称的弗兰克对自己所发现的東西的惊奇。因为在研究小组内我尽最大努力让学生们寻找和期待真实世界上出现不相一致的行为。在一个开放世界上，令人奇怪的是基本规则始终如一地得到遵循的情况。然而，我准备相信弗兰克已经把我教给他的东西都还给了我，学生历来如此。但是，当我重新阅读他的文章时，我吃惊得哑口无言。让我们看看

弗兰克是怎么说的：

乍一看，意大利城邦国家似乎构成了这种模型的历史原型，其近似程度与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条件限制下（加点字是引用者加的）所可能发现的一样。情况实际上是否如此的问题等到进行更大量比较研究之后再回答也许更保险一些；但是，城市国家系统与行为（基本）规则的理论说明，系统的其它变量以及参数并非在同一程度上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就很清楚。而且，人们还可以讨论表现出重要的参数和行为差别的连续阶段。

第二阶段，作为一种对原先就指出的条件变化的、多少有点延误的反应，可以根据新的互动模式尤其是联盟模式与第一阶段区分开。基本行为体的边界越互相接近，人们就会越迅速地发现并越始终如一地抗衡扩张威胁或其它颠覆能力的增强。

而且，就佛罗伦萨（和某种程度上的罗马教皇）而言，（规则）没有接二连三地被违犯是不够的，还应当有意识地、坚持不懈地防止违犯从规则三到规则六可能具有一定现实性这种局面的出现。

如果暂时撇开环境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意大利城市国家系统的内部平衡在第二阶段进一步增强。……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佛罗伦萨有意识地（加点字是引用者加的）充当“平衡者”角色的结果，正如先前遏制米兰大体上是威尼斯人扮演城市国家系统内调节角色的结果一样。

然而，第三阶段与前一阶段的区别首先是几个行为体系统内背离性统治者数量的增加以及因此而出现的行为模式的变化：无论是背离行为的模式还是进一步适应的反应模式都发生变化。

但是，意大利“均势”系统的第三和最后阶段则迫使我们得出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在第二阶段中有利于平衡的大多数参数到第三阶段依然存在；领土实力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而某些其它基本能力则接近相等，对于罗马教皇和那不勒斯来说

尤其如此，外交活动和外交机构继续迅速增加，而新的军事技术及其在防御方面特别是城市防御方面的不足仍然不被人们所接受。此外，基本规则成功地得以维持、结盟灵活性的明显增加以及调节活动的层次都似乎有助于平衡的进一步稳定。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平衡事实上已变得不仅不那么静止，而且不那么稳定了。这一系统最终解体了。这些结论只有在表面上（加点字是引用者加的）是相互冲突的——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从人们常常提到欧洲环境中的行为体的角度看是这样。在这种环境中，梅迪奇联盟从1450年起便明确具有双重目的：其一，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维持意大利的内部平衡；其二，把欧洲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非稳定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然而，正如弗兰克随后所指出的：

佛罗伦萨当时过于软弱而且在战略上过于外露，以致无法抵御居住在同一半球的一个或两个强大行为体的联合力量，至少在来自另外半球的一个或两个盟国不能提供及时帮助的情况下是这样……由于业已指出的两种情况——潜在的扰乱环境的行为体存在和这些行为体对两个意大利行为体提出的特殊要求——，这种中立的“平衡”角色所需要的灵活性在意大利系统内是缺乏的。假若当时这种封建的世袭关系不存在，干扰的可能性没有增大……

这一系统就可能不会变得不稳定了。弗兰克的结论是：在第三阶段，意大利城市国家系统的参数没有典型性，这些系数“不易受行为体补偿行动的影响”。

弗兰克的这篇内容复杂的文章是将一部基于大量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的、长得多的著作浓缩而成的。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在该系统的第一阶段中，那些城市国家的统治者毫不理解国际系统的本质。尽管该系统内的成员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数却始终保持在五个以上。弗兰克表明：意大利城邦国家系统

的那些与系统相关的特征不能说明第一阶段稳定的原因；沃尔兹的公式也不能解释这一点。正如弗兰克所正确地理解的那样，这一系统的持续存在是由于外部原因。这些城市中没有一个行政机构是长命的，它们高度依赖统治者的性格特征。因此，当某个特定的君主故去之后，本来可能成功地取得霸权的努力便归于失败。在一些别的时候，后勤和经济上的困难又使谋取霸权这种想法变得不太现实。在第二阶段中，“平衡者”洛伦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十分理解系统的本质，他努力使佛罗伦萨的联盟行为与系统稳定的要求相吻合。洛伦佐有关系统性质的自我意识是那一阶段稳定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雇佣制度也起了作用。然而，联盟的具体特点则部分是由该半岛特定的地理模式所决定的。在这一系统的最后阶段中，皮耶罗·德·梅迪奇不懂得系统的功能；虽然我有点过于简单化，但他没有能够自觉地充当稳定的角色这一点是把法国人引进来从而导致系统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时进行的其它研究中，有可能证明：象俾斯麦、卡斯尔雷和帕麦斯顿这样的政治家确实理解国际系统的性质，他们确实曾使自己的行动与这种理解相一致。尽管构成这种理解的种种要素还有待从文件和日记堆中找出来，但对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却没有什么严重怀疑。

有一种系统，在其将得以维持时，行为体在更为宽广的背景条件下不必有意识地考虑它的要求。对于这种系统，我们都很熟悉。由大量卖主和买主所构成的自由竞争市场就是这种系统。一般说来，只要采取最优最劣行为就够了。但这种情况通常不适用于那种行为体数目较少的系统，因为系统的具体特征不同。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如果不把“均势”同其它结构要素尤其是对基本规则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简直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加以讨论的原因。

沃尔兹还宣称，我用错了反馈这个概念：“恒温器是卡普兰和所有其他人最喜欢引用的例子……它与维纳的定义和这个定义所包含的意思——产生一个给定结果的控制器和被控制器——是一致的。但在国际关系中，有什么东西与这种概念相对应呢？没有。卡普兰使用了这个词，却没有考虑这一词的确切含义”。

沃尔兹是如何给反馈下定义的呢？他说：这个概念——

是从控制论中借用过来的。在控制论中，其定义（加点字是引用者加的）如下：“如果我们想让一个运动遵循一个给定模式，我们就应当把这个模式和实际完成了的运动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新的输入来促使所要调节的那部分发生运动，并使其运动方式更加接近该模式所给定的方式”。根据这样一个定义（加点字是引用者加的），反馈只在一个组织内起作用；也就是说，在等级秩序之外，反馈这一概念没有什么确实不同的技术意义。

读者很快就可以发现：沃尔兹关于反馈的例子是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948）那里搬来的，但这不是什么定义。事实上，维纳当初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定义。而且，它甚至不是对一般反馈的说明，而只是对反馈的一种具体类型——负反馈——的说明。它也构不成对负反馈的最一般形式的说明，而仅仅是对在（恒稳）平衡条件下的负反馈的说明。

但沃尔兹却声称，他可以从“这样一个定义”中得出：反馈“只在一个组织内起作用；也就是说，在等级秩序之外，反馈这一概念没有什么确实不同的技术意义”。

沃尔兹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等级秩序是什么意思，使我们如坠五里云雾中一般。我想他在解释这一词组与国际系统的关系时不很严密，其意思是说只有当权威等级的顶端存在着一个政治子系统时国际系统才会利用反馈；因为他还声称：“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什么东西……与产生一个给定结果的控制器和被控制者这样一种概念相对应”。

我仅举一例来消除这一混乱。我们来看一个戏法，其中，两个戏法演员不停地互相抛接大量的东西。如果负反馈不起作用，这个戏法就会大大失败。因为如果没有反馈，变戏法者就接不住不断飞来的物体。但是，这两个变戏法者之间不存在等级关系；他们相互协作，如同在一个子系统支配的系统内一样。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戏法何以保持连续不断这一情况可以在不同的抽象程度上得到解释：身体和物体相互协调的具体方面和“不要破坏运动的进行”的规则。

如果我们懂得：一个具体要素在不同的分析框架内可能会有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国际关系中负反馈的概念。在《系统与过程》中，政治系统被称为超稳的；所有超稳系统都包含控制子系统。什么是控制的工具？正如手臂是捡起铅笔的工具一样，国家行为体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什么是被控制者？在稳定的条件下，国家（或其它）行为体的行动旨在确保国际系统的状态不致偏离基本规则所规定的条件太远。当我们回头来看沃尔兹利用艾伦·道蒂（Alan Dowty 1969）反对我的观点时，我们将发现：沃尔兹反对我的理论框架，恰恰是因为这种框架是以反馈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因为我声称基本国家行为体在制订决策时考虑国际系统的状态。由于沃尔兹认为只有控制在其中占据唯一位置的那些系统才能是反馈系统，所以他不理解……也不能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反馈，甚至在他举例时也是如此。

沃尔兹提出、一些其他学者随之响应的另一个批评意见是：我的系统中没有结构。我简直无法理解这一说法。例如，什么是家庭的结构？家庭的结构应当包括父母和子女，如果家庭扩大的话，也许还要包括其它亲属。这将是一个结构但还构不成一个系统，因为它没有具体说明有关角色、能力、信息或者与平衡相一致的边界条件的规范性规则。我的理论，即使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理论。“均势”系统只有一种类型

的角色，即基本行为体。松散的两极系统有许多角色：集团首脑、集团行为体、非结盟行为体和非结盟组织。角色结构的差异与基本规则、能力、信息和边界条件的差异正好吻合。

只有这类对系统的说明才能使我们了解遵循基本规则的行为是由系统本身所引起的，还是由外部原因产生的。而且只有这套区分标准才能使我们判断出表面上与规则不一致的行为是不是由非平衡的边界条件所产生的。根据我的理论，用非平衡的边界条件来解释上述现象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若不进一步说明，就可能遭到否定。下面我将说明这一点。

理论模型是封闭系统而这些模型将被应用的现实世界则是开放的。从模型推演到现实世界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列举一例可能是有帮助的。我们将期望：在“均势”系统内，联盟将是短命的、建立在眼前利益之上的、和不重视现有的或先前的联盟状况的。1871年到1914年欧洲大国的牢固的联盟体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无节制的性质似乎至少在表面上与“均势”理论的规定是不一致的。诚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1871年到1914年这一期间牢固的“均势”系统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要照搬这类解决方法，我们就得根据一个不同的系统模型分析每一种特征上不同的世界状态，从而使“系统”这一概念丧失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而变成一个首先是描述性的词汇。替代的办法是看看“均势”系统的基本理论能否用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矛盾。

注意，我们没有说：如果“均势”系统的理论能够解释从1871年到1914年的行为差异，那么，这种解释就是对所观察到的行为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毫无疑问，在产生事件的具体序列以及这种序列所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其它因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只是说明：所谓不符合规则的行为并不会使理论变得无效；这一理论在把各种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可能是有用的，而且其范围比没有这样一种理论所可能做到的要广。这一点可能会

增强我们对于这一理论及其解释力的信心。

接着，是理论和行为的协调问题。如果我们认识到，正如有理由相信俾斯麦曾预见到，普鲁士夺取阿尔萨斯——洛林必然在法国导致一种复仇主义的公众舆论，我们就可以针对参数的这一变化根据与后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相一致的方式来设计理论。只要德国一天不愿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法国就是德国的敌人。因而，法国和德国就成为相互对立的牢固联盟中的两极，因为无论存在什么具体的共同的利益，它们都不会进入——或至少是保持在——同一联盟内。从理论上讲，限制战争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维护其它基本行为体的存在以作为未来可能的盟友。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是对方的可能的盟友。结果，双方都不想——正象在“权力平衡”系统内通常出现的情况那样——限制其反对另一方的战争目标。本来应当是限制战争的因素反倒变成刺激战争的因素。

许多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上的“均势”系统于1870年崩溃的原因时都强调了民族主义，这是错误的。虽然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确实影响了这一行为体作为一个基本行为体而活动的的能力，但民族主义是在行为体层次上而不是系统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当民族主义使俾斯麦无能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表现出理智时或者当民族主义影响了法国人的适当反应时，它同样是在行为体层次上而不是系统层次上发挥作用。而且，从国际系统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发挥这些作用纯属偶然。也就是说，从原则上讲，所有的行为体本来是可以既稳定又是民族主义的。只有当政策真正实施时，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冲突才会出现。没有一条原则规定在一个现实而充满民族主义的要存在一个类似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说从系统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对于“均势”系统的崩溃的影响是间接而偶然的原因。民族主义，同其它国内和国际因素一起，说明了一个参

数取它所取值的原因。在缺乏国际系统宏观理论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与平衡不一致的或者不能解释为什么它对系统产生它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宏观系统理论才能得出这样的认识 and 解释。

1870年之后的欧洲系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如何从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分析一个特定的事例。俾斯麦当时曾努力建立一个主要的、甚至可能是当时国际系统内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这种努力本身并不是非稳定性的。然而，为了获得国内的支持从而使他能够在萨多瓦事件之后阻止皇帝政策的实施以及为了追求其它目标，这使他不可能允许法国留有阿尔萨斯——洛林，尽管他当时就清楚夺取这个地方可能引起的问题。由俾斯麦一手搞起来的双保险协议是俾斯麦想拚凑一个他知道已经丧失某种程度的稳定性的系统的一部分努力。然而，在阿尔萨斯——洛林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支持他的国内力量却阻碍他采取明智的对外政策，而明智的对外政策是模型中稳定的一个条件。法国当时的公众舆论使法国也不可能实施明智的对外政策。后来发生的情况与这一理论在这组参数条件下所预测的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现实世界比任何系统模型都要复杂得多，所以理论框架不可能提供一种全面的解释。全面的解释还要求讨论奥匈帝国的稳定问题和一战前战争动员体系的特定条件以及许多其它条件。

另外，在表面上信息一致这本身不能证实什么，因为人们尚不能证明：那种局势足以与可以期望出现那种行为的条件相一致。例如，就弗兰克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系统而论，该系统第一阶段中表现出与基本规则一致的行为。但进一步分析则发现：这一行为的出现是由于缺乏一个在君主死后仍然存在的国家机构，后勤部门的低效率以及其它系统之外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一系统的稳定与“均势”理论毫无关系。如果没有国际关系理论或理论框架，甚至连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指出这些区别都是不可能的，

更别提证明了。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使用这种理论框架，我们就能更系统和更加前后一致地寻找那些产生或加强平衡状态或非平衡状态的参数。因而，就有可能制订出更为系统的研究计划。

我认为，这一学科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世界和平教授协会 主席

华盛顿时代公司月刊杂志《世界和我》

编辑和出版者

莫顿·A·卡普兰

1988年9月